

张子清
戴维·埃文斯 主编
简·埃文斯

文化相聚

美国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在中国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512898

D609.9

Z250

主编

美国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在中国

文化相聚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6512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相聚:美国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在中国/张子清,
(美)埃文斯(Evans, D.), (美)埃文斯(Evans, J.)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9

ISBN 7-5633-4162-5

I.文… II.①张…②埃…③埃… III.访华
观感-美国-现代 IV.D6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327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271000)

开本:965mm×1270mm 1/32

印张:11 字数:288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1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美国富布莱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 1993 ~ 1994)资助



张子清、戴维·埃文斯、简·埃文斯，摄于美国南达科他州。

前言

出国旅行的人至少要带两样行李：有形的行李和无形的行李。后者是文化设想、期待、观念以及在国内从小养成的行事的方式与方法。我们像其他许多美国人一样，在中国生活了一个时期。1988年，我们作为与云南师范大学校际交流的教师，在昆明教书一个学期。那次经历对我们的影响很深，我们决定再回到中国。1992至1993年，我们在南京大学教书一年。1999年，我们在广州外语学院教书一个学期。

1993年回到美国之后，我们同我们的朋友张子清决定开始收集去过中国的美国人写的文章，他们多数人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先后到过中国，那时中国开始对西方开放。我们注意到，曾在中国生活过一个时期的美国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和旅行者跟我们一样，深深地受到他们在中国的经历的影响。例如，生长在明尼苏达州中西部小镇的比尔·霍尔姆在西安教书一年，回国后写了一本书《我回国后变啦》，表明中国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另外一个作者迈克尔·特鲁在他的文章《长江之游》里说：“中国之行重新整理了我的头脑和我内心世界的地理方位。”

自从我们开始为这本选集收集材料时，中国的经济很快地增长了，最近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并被选为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国家。而美中关系很复杂，特别是围绕2001年纽约遭受恐怖分子袭击的“9·11事件”以来，相互摩擦不断。当然，两国没有兴趣相互为敌，而是珍视合作和交流。也许美中两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切地促进和鼓励相互对话与理解。

我们相信，《文化相聚：美国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在中国》这本书有助于美中两国的对话和理解。借用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中的话来说，人们易于贬低和自己不同的人。换言之，如果我们花时间去发现外国人的情况，我们通常不喜欢或者害怕外国人的理由就比较少。这当然适用于美国人，也适用于中国人。

这本文选虽然内容庞杂,但其作者可以分为几组。

最大的一组是在中国的大学里教书的教授和教师。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对有关中国大学里的人和事也写得较为深入,例如,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凯利、莱巴农瓦利学院阿瑟·福特教授等。又如,在南京大学任教的安吉拉·贝利描写她与南大学生到校外为一家烧鸡店做广告的有趣经历,表现了她和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文化交流。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韩南虽然没有时间在中国教学,但他在任哈佛—燕京学院院长期间每年去中国招收访问学者,对中国的大学情况非常熟悉,同中国学者的感情至深。

另一组是曾在中国教书或访问过中国的美国作家,例如,斯蒂芬·黑文、比尔·霍尔姆、理查德·特里尔、纳撒尼尔·塔恩、彼得·赫斯勒、埃德温·霍尼格、詹姆斯·谢里、汉克·雷泽尔、伦纳德·施瓦茨、布兰达·韦伯斯特等。塔恩回顾他在吉林大学教学的美好时光。特里尔描写他在保定教书时的艰苦生活,那里的生活之简陋如同19世纪的梭罗生活在森林的小木屋里。霍尼格纯粹描写他旅行时的个人观感和拜访中国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及其家人的印象。詹姆斯·谢里和汉克·雷泽尔应邀在北京、成都、南京和苏州等地进行了成功的诗歌朗诵,并与中国诗人进行了深入的座谈。美国西部笔会主席、小说家布兰达·韦伯斯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朱虹的引见下,访问了杜鹏程妻子问彬以及宗璞、张洁、陆星儿等中国著名女作家,并和她们进行了畅谈,为中美作家交流史增添了闪光的一章。安妮·迪拉德1982年5月作为美国作家访华代表团成员,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参加了中美作家的正式交谈。从她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到刚从“文化大革命”阴影走出来的一些中国作家心有余悸的心态。特别要提的是,著名戏剧家阿瑟·米勒在中国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和火车列车长的有趣谈话不但很富情趣,而且反映了这位戏剧家锐敏的观察力。他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在北京的演出是中美两国文化交流的大事。

第三组是到中国去访问的艺术家,他们与中国画家交朋友,建立友谊,例如,画家芭芭拉·伦道尔特-比安奇、戴尔·斯特朗和黑人画家厄尔·马修斯。斯特朗甚至和热爱艺术、热衷于中外艺术交流的大学英文女教师结婚了。

如果这本文选是记录美中两国之间对话的话,那么它包括了美国人

的个人惊喜的发现和愉悦的体验。桑迪·科恩欣喜地发现了中国最冷的城市——哈尔滨及其冰雕。多萝茜·津博格于20世纪80年代对四川农村的一个农民百万富翁的访问使她高兴地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有了具体的认识。美国犹太人朱迪思·克林霍弗在开封访问定居中国的犹太人后裔,大有寻根的无限感慨。华裔美国作家梁志英访问中国更表现了他寻根的感情。鲍勃·科恩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贵州偏僻山区岩洞探险,吃了不少苦头,但感到愉快,与当地人的交了朋友,临别时难舍难分。有趣的是,2.03米高的克里斯·瑞仲卡因为自己的身高被中国的老百姓围观时本来感到很不自在,但通过访问北京雍和宫的老喇嘛之后顿生禅悟。

但是,有一些美国人在中国遇到意料不到的情况时心情感到不太舒畅,部分地说明美中文化的交往有时有的地方融洽,有时有的地方不是那么太融洽。玛丽·金努能和她的家人从昆明乘硬卧去西昌游览,使她大为扫兴的是,乘客抽烟,弄得车厢里烟雾腾腾;车厢拥挤不堪,轮流去厕所的人川流不息;车厢里响着咳嗽声和吐痰声。盖尔·华莱士·博扎诺因为中方外办人员的工作方式生硬而又不善解人意而感到失望。阿瑟·米勒对距他住地不远的地方杀猪感到不自在。

从我们收集的这些文章所反映的情况以及我们自己几次在中国教书的亲身经历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两件事:首先,不论何地、何种肤色、语言、历史或信仰,基本的人性是相同的;其次,如果你对外国,尤其对中国(那里看起来也许很奇特)保持开放的心态,并且设身处地,那么你就会常常发现有价值的事物。约翰·布莱恩·斯塔尔在他的《了解中国》(*Understanding China*, 1997)的结尾处说:“……鉴于中国的面积、潜力,在经济、政治上和世界各地联系的程度,我们在未来的几年,不可避免地要同中国打交道。”我国同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而且要在文化上建立联系,展开对话。我们相信,这本反映曾在中国生活、工作和旅游过的美国人的见闻和反思对促进美中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对话大有裨益。

戴维·埃文斯

简·埃文斯

2002年5月4日于美国南达科他大学

(张子清译)

序 言

人们曾幻想 21 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世纪,然而事实并非如人所愿,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生态危机、贫富鸿沟、强势文化横行等无不使人感到忧心忡忡,同时又感到万般无奈。在这样的情境下读到张子清和戴维·埃文斯、简·埃文斯主编的《文化相聚:美国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在中国》,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

在这里相聚的都不是什么大名人,而只是普通的教师、作家、旅行者,真正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人们。他们以一颗平常心过着平常生活,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别。他们多半从强势的美国文化中来,却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特权,更不因此而藐视他人,而是真诚地、谦逊地对这样一个他们并不熟悉的古国文明探索着、欣赏着、吸收着,因此他们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收获。例如生长在明尼苏达州中西部小镇的比尔·霍尔姆在西安教书一年,回国后写了一本书《我回国后变啦》,他认为一年来在中国文化的浸染下,他的许多看法都有了改变。另外一个作者迈克尔·特鲁在他的文章《长江之游》里说:“中国之行重新整理了我的头脑和我内心世界的地理方位。”

由于他们的真诚,他们笔下的中国也并不是全是美好。特里尔描写他在保定教书时生活之简陋如同 19 世纪的梭罗生活在森林的小木屋里。玛丽·金努能和家人从昆明乘硬卧去西昌游览,使她大为扫兴的是,乘客抽烟,弄得车厢里烟雾腾腾;车厢拥挤不堪,轮流去厕所的人川流不息;车厢里响着咳嗽声和吐痰声。盖尔·华莱士·博扎诺因为中方外办人员的工作方式生硬而又不善解人意而感到失望。剧作家阿瑟·米勒则因离他住处不远的地方正在杀猪而感到不自在等。

但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们以一颗真诚的心去接触和理解中国和中国的普通人。当哈佛大学原英美文学系主任罗伯特·凯利得知一些学员为了来听他的课而不惜乘火车花了七十个小时时,当他发现一个最年轻的

学员主动背诵他喜爱的弗罗斯特诗篇《没走的那条路》时,他是那样地出乎意料,“感动得几乎要掉泪”。他一再扪心自问:“这些人为什么这样感动我?为何他们给我这样深的印象?为什么他们引起我如此大的注意?”答案是:你不能不喜欢如此机灵、热情、温和而好学的学员!但又不仅仅如此,教授说他在这里见到的一个个研究生和学者虽然和他在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和同事一样,做着同样的事,但这些面孔所显示的精神,却是“我在哈佛从来没看见过的。他们很少有教材,没有补贴,只有最微薄的基本补助,有时处于极度的困难之中,但他们仍然热爱书本和学习。当我这样写时,这一切听起来几乎太‘中国化’了,但我常常暗忖: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多么的光荣”。

他与中国的学生和同事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们一起读书,一起骑自行车,看电影,吃饭,爬山,听音乐,一同过节日,一起去城里采购,游览公园,或者逛新城和旧城,参观解放展览馆……教授生动地描写他们一起走过弯弯曲曲的小巷,“小巷里挤满了户外的小面摊、理发铺、裁缝铺、烧饼店,街道边摆着出售的洋葱、大蒜、大米,各种清香的茶叶、香料,鸡、鸭和挂在铁钩上晃来晃去的猪肉”。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这位美国顶尖大学的顶尖教授在最普通的中国日常生活中,在最普通的中国市镇与最普通的中国人中产生了如此真挚、如此深厚的感情,他说,“我的妻子和我发觉与我们的中国研究生告别时特别地难舍难分”,因为“在中国感情过露不好”,于是他不得不“搜肠刮肚地寻找告别的话语”!最后,他的学生们以“最富中国气度的方式表达了他们的心意……他们突然打开了送给我的一幅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写的卷轴,他用草书写了三个大字:‘彩云飞’”。他们祝愿自己的朋友,如绚丽彩云,高飞远行!

多么和平、多么宁静的心境!多么真挚、多么动人的感情!那份平常,那份闲适,那份纯真,给我们留下了不灭的记忆!我不能不向这本书的三位编者致以深切的谢意,是他们汇集了这些美丽的片刻,使之永存!如果属于不同文化的普通的人们已经构筑了相互理解和相互欣赏的温暖的春天,那么相继而来的,会是仇恨、屠杀和战争吗?是为序。

乐黛云

2003年1月24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中美文化相聚在中国(导论)

——历史回顾与现实追踪

在过去,中国从来认为自己是世界中心,到了腐败的清朝时更加如此,虽然国力日衰,但仍然用大清之类的老大自居的观念看待日益强盛的外邦,结果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日寇大举侵略中国;结果是民不聊生,以“东亚病夫”闻名于世;结果是中国人在国外受鄙视,被称为“不开化的野蛮人”。于是在美国诗歌中出现了可恶可怜可悲的异教徒中国佬^①,在美国舞台上出现了无知无能的傻子中国佬阿辛^②,好莱坞电影里出现了讨好白人而低能的陈查礼、对白人心怀叵测的邪恶的傅满洲。19世纪和20世纪早叶,中国人在美国人的心目中是贫困、落后而愚昧的民族:男人拖着猪尾巴式的长辫子、女人裹着小脚。当时的美国文学家、艺术家按照如此丑化中国人形象的模式创作的文艺作品既反映了当时美国人对落后的“中国佬”的看法,也满足了当时美国人对中国人怀有偏见的想像力。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中美文化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显然是不可能的,更别指望美国作家、学者和艺术家到中国来体验生活。即使是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有浓厚兴趣的伊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和肯尼斯·雷克斯罗思(Kenneth Rexroth, 1905~1982),也只是停留在对孔孟之道和中国古典诗歌的欣赏和译介上,他们并没有到过中国,直接和中国人民接触,同中国诗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但他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却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对中国诗歌的概念,甚至在今天,一般美国人对中国诗歌的了解仍然是通过他们的尤其是庞德的译本取得的。

① 19世纪走红的美国作家布雷特·哈特(Bret Harte, 1836~1902)在他流行一时的诗篇《异教徒中国佬》(The Heathen Chinese)中嘲笑去美国做工的华人为不开化的野蛮人。

② 布雷特·哈特与马克·吐温合作的喜剧《阿辛》(Ah Sin)中的主人公,一个可笑愚蠢的“中国佬”。



到了20世纪20至40年代,才开始有一小批美国作家、记者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社会才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体验。他们当中著名的有兰斯顿·修斯(Langston Hughes, 1902~1967)、W.H.奥登(W.H. Auden, 1907~1973)、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 1905~1972)、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 1892~1950)、斯特朗(Anna Louis Strong, 1885~1970)、项美丽(Emily Hahn, 1905~1997)、约翰·赫西(John Hersey, 1914~1993)等。

1933年,兰斯顿·修斯访问苏联后来到中国。在上海,一天晚上的作家聚会上,他有幸见到了鲁迅。他还受到了宋庆龄的款待。一群中国记者和作家设午宴招待他,他在午宴上见到了正在翻译他的小说《不是没有笑》(*Not Without Laughter*, 1930)的年轻中国译者。修斯还来南京游览了中山陵。

1938年2月,W.H.奥登和他的朋友伊舍伍德对抗战中的中国进行了为期四周的访问,深入到中国郑州、西安、苏州、南昌、金华、温州等地采访,并且受到蒋介石和周恩来的接待,当时各大报纸对此进行了新闻报道,影响很大。奥登描写牺牲在战场上的一位无名战士的一首诗被著名作家洪深翻译,以《无贵无贱都已把他忘却》的标题刊登在武汉版的《大公报》(1938年5月22日)上。他们采访的结果是第二年出版的包括诗歌、日记和报道三部分的《战地行》(*Journey to A War*, 1939)。奥登成了当时“西南联大青年诗人心目中的偶像”,对西南联大的校园诗人影响颇大,促成了“西南联大诗歌现代化精神的生成”。^①

1941年,海明威和他的夫人玛莎·盖尔荷恩一道,对中国的抗日战区进行了考察,分别会见了蒋介石和周恩来,回国发表了六篇中国抗战的报

^① 杜运燮、张同道主编《西南联大现代诗钞》,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587页。

道^①，对在美国宣传抗日起到了积极作用。

1928年，埃德加·斯诺来中国学习汉语，研究中国国情，在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教书。南京大学外文系梁士纯教授原来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是斯诺的领导也是朋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想，通过新闻媒介，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1936年，斯诺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成了中国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朋友。次年，他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名著《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 1937)面世。他于1941年回国，1960年定居瑞士。中国解放后，他三次访华(1960, 1964, 1970)，回国后写了多篇有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文章。根据他的遗嘱，他逝世后，他的一部分骨灰已经安放在原燕京大学即今北京大学的校园里。

1928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华，在上海参加中国进步的文化运动。在上海期间，她住在宋庆龄家的附近，为宋庆龄做一些类似秘书之类的工作。她像斯诺一样，也去过延安，并在山西抗日前线当过战地救护员。30年代，她为王莹的演出进行过报道，1941年因病回国。当她得知王莹和谢和赓留学美国后，立即和他们见了面。谢和赓根据亲身经历，认为史沫特莱是王莹的密友，她俩相互帮助，坦诚相见。史沫特莱和赛珍珠(Pearl Buck, 1892~1973)一道帮助王莹修改和润色准备在世界青年学生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为此，史沫特莱暂时放下朱德传记的写作，专程来到王莹身边。她去英国时，把大量的藏书留给了王莹。她视中国为她的第二故乡，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按照她的遗嘱，她的骨灰安葬在中国。她反映中国革命的著作有《中国人的命运：今日中国速写》(*Chinese Destinies: Sketches of Present - Day China*, 1933)、《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 1934)、《中国在反击——一个美国女人和八路军在一起》(*China Fights Back*, 1938)^②、《中国的战歌》(1943)^③、《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The Great*

① 海明威于1941年6月10日至18日发表在纽约《午报》上的六篇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是：《苏日签订条约》、《日本必须征服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空军急需加强》和《中国加紧修建机场》。

② 1987年出版中文本。

③ 1986年出版中文本。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he, 1956)^①等。中国人民没有忘记她, 1992年在上海举行了她的百岁诞辰纪念活动, 2002年在北京举行了她的一百一十岁诞辰纪念活动。

1921年, 斯特朗首次去苏联, 并在那里定居, 此后近三十年来往于苏美之间, 1949年在苏联被错指为“间谍”, 几年之后得到平反。她六次来中国, 1958年定居北京。在定居中国期间, 她出版不定期的《中国通讯》(*Letters from China*), 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情况。新华出版社曾出版她的三卷本文集。

项美丽作为记者, 虽然在文学成就上不能与赛珍珠比肩, 她却有幸和知名度颇高的新月派诗人邵询美(1906~1968)建立友谊和爱情, 从而名播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她见过年轻时代的毛泽东, 采访过宋氏三姐妹和蒋介石。从1935年到1944年为止, 她在远东住了九年, 其中五年在上海度过, 并与有妇之夫的邵询美结婚(解放前中国男子娶妾是合法的)。1936年, 她与邵询美创办中英文对照的杂志《声音》(*Vox*), 只出版了三期就告吹了。接着他们又创办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两种杂志: 中文杂志《自由谈》, 由邵询美负责; 英文杂志《耿直评论》(*Candid Comment*), 由她负责。这两种杂志在沦陷的上海颇受读者欢迎。抗日战争时, 上海形势恶化, 她移居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她和原英国少校、东方学者查尔斯·博克塞结婚, 先后生了两个女儿。后来邵询美因公出访美国时, 特地去纽约探视她, 并赠送给她的女儿卡罗拉一个漂亮的洋娃娃。1983年, 项美丽重访中国时得知邵询美已于1968年去世, 于是同邵询美的女儿、南京口腔医院医生邵绡红及其丈夫夏照滨教授保持联系, 后来在纽约接待过邵绡红。自从1929年, 项美丽一直为《纽约客》撰稿, 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和短篇小说, 同时一共出版了五十二本不同体裁的著作。其中《宋氏三姐妹》(*The Song Sisters*)、《仅是昨天的中国》(*China Only Yesterday*)、《中国对我意味着什么》(*China to Me*)等书, 为了解和研究中国现代史和邵询美在30年代的文学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项美丽晚年积极投身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环保运动, 为《纽约客》杂志社工作到去世为止, 创作生涯长达七十年。

也曾任《纽约客》杂志社编辑部工作过的约翰·赫西出生在天津, 在天

① 该书英文本出版于1956年, 日文本于1955年, 中文本于1979年。

津接受早期启蒙教育,其父母是来华的传教士,1936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任《时代》杂志远东记者。二战期间,他作为战地记者同时为《生活》杂志和《纽约客》撰稿。他战后潜心于小说创作,主要取材于二战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出版了多部小说,其中小说《阿丹诺之钟》(*A Bell for Adano*, 1944)获1945年普利策小说奖。从此,他脱颖而出,一跃成为美国名作家。他是冯亦代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结识的朋友。1980年,冯先生访美时在纽约与他相见。在欢迎冯先生的宴会上,新闻记者兼作家白修德(特德·怀特)在回答冯先生关于独具风格的当代美国作家是哪几位时指出四位:赫尔曼·梅勒(Herman Mailer, 1923~)、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 1915~)、詹姆斯·密切纳(James A. Michener, 1907~1997)和约翰·赫西。约翰·赫西一共出版了二十五部书,其中有数部取材于中国。《一只石蛋》(*A Single Pebble*, 1956)描写20世纪20年代一个年轻的美国工程师希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改造和利用长江的故事,故事的意义在于赫西很早就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与环保的关系问题。

前面提及的美国作家由于和中国政治、文化、社会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或怀着正义感到中国来,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为困难中的中国人民说话,这使我们对他们永怀感激之情。但如果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相比,谁也不会像她那样和中国文化血肉相连,唇齿相依。

赛珍珠在出生三个月后便被父母带到了中国。她的一生前四十年,除了回美国读四年大学和硕士外,在中国度过了她的童年和青少年。1919年,她和丈夫来到金陵大学任教,从此在南京生活了将近十二年。她当年住的小楼房仍然在南京大学校园里。她在这座楼房里完成了她后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包括《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在内的主要作品。她的乳母王妈、她的启蒙家庭教师孔先生、她的干姐朱彩云、她在镇江润州中学教书的学生徐国懋先生、尹珍珠女士和李美云教授、她的中国小说史辅导老师龙墨乡先生、她的金陵大学的同事戴安邦教授等是她从小到大联系中国文化的直接纽带。自小在中国的学习和文化的熏陶使她不但精通《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和《西游记》,而且熟悉连一般中国学者都很少涉猎的《太平广记》、《会真记》、《野叟曝言》、《镜花缘》等古典文学作品。按惯例,各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给他或她举行的授奖仪式上要发表一篇对人生、社会、历史和文学等见解的演说,而在这种隆重的场合

专题介绍别国小说的发展史尚无前例,赛珍珠却破了这个例。她发表了题为《中国小说》的长篇演说词,向世界如数家珍地介绍了中国小说的来龙去脉。如果你只听她用汉语(她能,如果她想这样做的话)演说而不看她的外表的话,恐怕你会以为她是家学渊源、中国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作家。只要审视她的文学创作和理论,你就会发现赛珍珠显示了鲜明的中国气派。在中国的长期生活使她的多数作品凝聚了她丰富的中国生活经验和独到的体验,溶入了她把中国作为第二祖国的价值判断和主观意念,真实地反映了中国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难怪中国著名作家徐迟先生在评论赛珍珠时说:“她写的不比我们最好的作家写的作品差,但比我们的最好的作家写的多得多。”

赛珍珠在表现东西方文化冲撞与融会时往往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待西方文化。曾一度是赛珍珠朋友的梁实秋和后来定居美国的黎锦扬用英语创作,在美国出版作品,但他们主要描写的是根据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体验,并没有以美国人为主人公,也没有从美国人的视角看待中国文化或中美文化的异同。从文化和文学比较学上看,赛珍珠显然是更深入了一层,她居然能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令人信服地描述中美文化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是她开创了中美文化比较和跨文化对话之先河的。

二

从 1949 年至“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时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空白点,除了极少数对中国革命同情的作家和记者例如埃德加·斯诺和斯特朗,当然更谈不上大量美国知识分子自由地来到中国。自从中美恢复邦交、“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来,中美文化交流才成为可能,而且日渐频繁。本书收集的五十位作者是美国作家、学者和艺术家,他们作为美国文化的使者,来到中国进行中美文化交流。这些交流的空间跨度:涵盖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全中国,其中包括大小城市、农村、边寨、崇山峻岭、优美的风景区、荒凉的沙漠;时间跨度:20 世纪 70 年代晚期至 21 世纪早期,他们在中国的时间有短有长,短则一两个星期,长则一两年,甚至许多年;交流方式:旅游、访问、考察、在大学里学习和教书

或联姻;社会接触面:除主要接触中国的作家、学者、艺术家外,还接触到中国的高层领导、普通干部、平民百姓、少数民族以及僧侣和教徒。可以说,这是一部美国人从他们的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革和精神风貌等方面的历史记录。这也是美国人到中国来进行的跨文化对话,因此从他们的个人记录里,我们不但从侧面看到了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历史时期的足迹,而且清楚地发现我们自己难以觉察的宝贵之处和疏忽、失误的地方。同时,我们也看清了中美文化交流在新的历史时期逐渐显现的几个主要特点。

特点之一:平等的文化交流

意大利波洛那大学哲学教授恩贝托·埃科(Umberto Eco)在论述东西文化的差异与共存时指出,“两种不同文化相聚,由于相互间的差异,会产生文化间的冲撞”从而产生“征服”、“文化掠夺”和“交流”。^①他概括得很精辟。中国地大,人多,历史长,从来不可能被包括日本侵略者在内的任何帝国主义所征服,但我们并没有忘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掠夺;没有忘记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大肆抢夺中国文物。至于文化交流,恩贝托·埃科说:“这是一互相影响和尊重的双向流程,欧洲和中国的最初接触,情况正是如此。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时代以来,尤其是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时代,两种文化就在交流各自的秘密。中国人从耶稣会传教士那里接受了欧洲科学的很多方面,同时,传教士们又将中国文明的方方面面带回欧洲。”^②是的,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我们不会忘记弱国无外交的教训。设想如果没有震惊世界的成吉思汗建立强大的元朝政权的话,马可·波罗可能在13世纪来中国,并乐意在元朝做了十七年的官,乐意游历整个中国吗?如果明朝没有经济实力派郑和扬帆海外的话,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有兴趣来中国传教的同时向中国介绍西方的自然科学,主张将孔孟之道和宗法敬

^① 恩贝托·埃科:《东西文化的差异与共存》,载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一)》,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83页。

^② 同上,第83~84页。